

# 文华生活回忆

## ——据钱亚新先生生前录音整理

### 钱 亮

1923 年暑假,我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了一年后,因为身体衰弱,加上家中经济困难,便休学到姊夫徐子华当校长的小学里教书。

1925 年“五卅”运动中,上海成立了一所国民大学,校长是革命元老章太炎先生。当我看到它的招生广告中有一个图书馆学系时,感到十分好奇。我写了一封信给系主任,要求访问一次。经约定,系主任杜定友先生在学校会客室接见了。他面目清秀,精神饱满,开门见山地回答了我信中所提的问题。他谈到普及图书馆、发展社会教育以达到救国救民目的的重要性,也提到目前全国缺乏图书馆事业的专业人员,就业可靠。和杜先生握手告别时,我除了表示衷心感谢他的接待外,还说明了我想插班的愿望。他点头微笑表示欢迎。

我在 9 月注册入学,直接成为图书馆学系二年级学生。专业课有杜先生的“图书馆学概论”和胡朴安先生的“校仇学”,选修课有周予同先生的“国学”、何炳松先生的“史学”以及一门“心理学”和一门“英国文学选读”。

1926 年 5 月,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在报上刊登启事,招收大学肄业两年以上的插班生,学习两年,学费、宿食费全免。当我与杜定友先生商量时,他竟无私地鼓励我去考,并说文华设施完美、师资雄厚,是一次极好的机会。我开始担心这次考试有的课要用英文笔试,其中还有一门“经济学”根本没有学过,经杜师鼓励,便去报名,同时到旧书摊买了一本“introduction of economics”,奋力研读 2 个月,终于参加了 7 月份在上海考区举行的考试。

暑假 8 月中旬的一天,我住在姊夫那所学校里,当时我正在休息看小说,姊夫突然跑来对我说:“恭喜你,恭喜你,武昌学校来通知,你已经被录取了。”我顿时高兴得了不得,立刻回到姊姊家告诉她,她也异常高兴。这样,今后两个人读书就不成问题了。

可是过了 8 月、9 月,始终没有接到学校通知。

当时正是长江发大水、北伐军打到武昌的时候,因此我想大概不会开学了。心中尽管非常着急,但也毫无办法,只好耐心等待。一直到 9 月底才接到学校通知说:学校准备照常开学,但要推迟 1 个多月,希望学生在 10 月 5 日前到校,在报到之前,要求各人对自己身体找医生检查一下,填一份体格检查表到学校来报到。

我感到时间已很紧促,立刻到医院检查了身体,幸好没有什么毛病,还算健康。出发前姐姐嘱咐我出门在外,远地读书,特别要注意身体,常常写信回来。

10 月 2 日,我从上海出发,坐上去武汉的大轮船。读中学时我曾坐过长江轮船到南通参观,那次只是一个晚上就到了。这次路程就比较长了,从上海到武汉要两天多,一路经过南通、镇江、南京,到芜湖时正是早上。在甲板上看到有一群十几岁的小孩,一个个跃入水中摸东西。他们先过来向乘客要钱,谁将小角子丢入江里,他们立即钻入水中,从江底把钱币拾起来。我也花两角钱试了一次,果然不到两分钟就拿上来了,潜水本领不凡。船继续向上游驶去,经过一座小岛似的小孤山,抵达九江时,我上岸走了一程,只见街两边摆满了各种瓷器,琳琅满目。

经过黄石,最后到达汉口。上岸时,看到学校派人在码头上张了一幅横联,专门接待考取文华图书科的学生,使我很感谢,同时也省却了许多麻烦事。我们从汉口再一次坐上小轮船到武昌,大约花了两三个小时抵达学校。

学校在武昌的东北,在华中大学里面,大门非常漂亮,进大门就是一条宽大的通道,两边树木葱葱,走过一层台阶,接待的同学把我们一直带到宿舍里。宿舍名叫伯乐堂,每人有一个房间,不太大,大约 8 平方米,可以摆下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个书架。我分在第 3 号房间,前边有一排宽大的阳台,面对阳台

是一个小操场,操场对面是一座礼拜堂,这是一所教会学校。

把我们安顿好后,就让大学去再做一次体格检查。这次是由一位美国医师担任的,据称是肺科专家;当时学校有一条规定:凡是患有肺病的学生,是不能入学的。经过检查,我没有肺病,不过医师对我说:你的心脏不够好,以后决不能抽烟喝酒,否则心脏会更糟。我听到后认真地答应下来,至今不忘。

几天以后就开始上课,我们的课堂和普通教室有些不同,它就设在图书馆里面,因为我们学的主要是图书馆学。不过,当时它的名称非常特别,叫作文华公书林,其实它就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意思,对外开放。我们是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的学生,班主任是胡庆生先生,其他老师有沈祖荣先生,还有一位外国老师叫 Miss Wood,专门教英国文学。胡先生教外文工具书,沈先生教图书分类法和编目法。另外我还选读了两门图书馆学以外的功课:一门是社会学,一门是打字,都是由外国老师教的。总共五位老师中有三位是外国人,他们上课都直接用英语讲授,幸好我曾经花过不少时间学英文,虽然开始比较吃力,慢慢也就能听懂了。

同学中考取公费生的一共有9个人。可能是由于经费限制。这是一个外国办的教会学校,经费是由当时教育部拨给的庚子赔款。据说总共拨款是一年一万元,我们每人费用200元,8个人1600元,其它为部分老师的薪金,所以经费不够充分,另有一些老师的薪金则另有来源。

开始的时候总共只有五门课,比起以前在上海读书时少。其中打字这门课主要不是上课听讲,而是不断地练习打字。老师除教一些指法外,就让你大量练习,交练习的时候有一个条件:不许打错,不许用橡皮擦,如果擦了改正,他是不接受的,要你重打。这是一种严格的训练,因为当时编西文目录都是靠手打。我对这种学习方法比较欣赏,也能认真去练习,达到要求,并在以后学习外文编目课时派上了用场。

在第一年里,我学习很努力。这时,正是北伐成功,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的前后。到了1927年4月,蒋介石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,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分裂,而蒋介石则封锁长江,不让上海轮船开往汉口。由于汉口有许多物资要靠上海方面输送,以致局势变得很紧张,于是学校在5月宣布提前放暑假,并规定所有学生一律回家,不准留校。

当时还有去上海的轮船,但船票很难买到,经过

努力,好容易和同学于熙俭买到了两张票。上了船以后,卖票给我们的人说,你们的票要还给我。“为什么?”我们就是这个规矩!”没办法,只好还他。后来查票的时候,我们这批没有票的人竟有二三十人之多。正在着急的时候,轮船上的账房先生说“你们不要急,跟我来。”便把我们带到锅炉房里躲起来,并说大家放心,不会有人到这里查票的。经过一个小时才把我们叫上去。这一小时里,人人满头大汗,我更是心慌失色。幸好同学很心定,并劝我静下心来。我想到这不是上当买了黑票吗?这说明当时有码头上和船上相互勾结,一张票反复卖四五个人,以饱私囊的现象。

回到上海姐姐家里,于熙俭同学去了他亲戚家。我便开始准备暑假中学校布置的作业。临走时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写一篇文章作为假期作业,于是我选了著者号码编制法作为研究题目。

过去,学校里的图书在著者号码处理上,用的是按字典部首加上笔划编制的。譬如姓江,著者号码就先用“丿”,再加上“工”字的三画。姓钱,则用金字旁再加五画,编写起来比较麻烦;在学校上课时老师也认为太麻烦,应当改进。当时还有一种方法,是采用王云五四角号码法,如江为3111,钱为8315,这在编写时虽然简单,但它只能解决姓的排列,如果加上名字,岂不要加到12个号码,也不方便。因此我便设想采用另一种方法。在编外文书时,著者号码先用姓的第一个字母,如Dewey先用D,将所有同姓的排队后再给一个号码;于是我采用这种方法给中国的著者编码,采用英文字母加数字作为号码。开始研究的时候,先根据商务印书馆人名大字典收集姓,大约有两千多个,再按拼音排除,给一个字母,然后根据笔划算以不同数字号码。第二学年开学时,我将这份稿子交给学校,老师看后组织大家讨论,我自己的想法作了说明。同学们也提了不少改进意见,有人提出根本不必去数笔划,因为数起来太麻烦而且会弄错,可以完全采用外国名字Cut的办法来编码。我虚心地接受了这个意见,修改了两次后获得通过,学校也很重视,准备出这本著者号码编制法,并冠以文华图书馆丛书之一的称谓,并署名宜兴钱亚新编。这本书于1928年11月出版,那时我已毕业参加工作了。

第二学年的功课,图书分类法、图书编目法继续进行,社会学、英国文学和打字课不上了,新添了几门。其中版本学由徐行可先生讲授。他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,在武汉地区藏书最多,对版本非常熟悉。

当然,那时候的藏书主要是古代线装书。有一次讲完课后,大家提出要求,想亲眼看一看各种不同版本。他说那好,下一次就到我家来上课。那一天,大家高兴地来到他家里,竟有两三间屋子,书橱内摆满了藏书。他在书房里摆出了准备好的宋版、元版、明版和清代的各种样本,其中有的书还附有索引。琳琅满目,让我们尽情欣赏。

快毕业之前,1928年最后一学期功课比较少,我想到自己应该将近两年学到的知识作个总结。由于自己平时对外文工具书这门课比较感兴趣,尤其对索引问题特别感兴趣,加之平时做了一些笔记,便考虑是否就这个题目编出一本书来。恰好在此时我看到一本专讲索引编制方法的英文书,我便参考它拟了一个大纲,分为两大部分:前部分讲什么是索引,后部分讨论编制索引的方法,并开始编写。内容包括索引和索引法的意义、索引与目次目录的区别、索引的不同类型和索引的方法,并专门举例讲对一本书做索引时,如何做准备工作、如何逐条著录、编制卡片、整理编排、如何在再版时加以改进。每天晚上从8点写到11点,经过半年时间,终于将此书完成。在毕业离校前,我将这篇书稿交请沈祖荣先生看,小册子的标题就叫《索引和索引法》。临行前,沈先生对我说,这本小册子写得不错,嘱我到上海后找商务印书馆,看看能否出版。

毕业那一天,举行了毕业典礼会,大家拿到了文凭,都很高兴。那么,我们是怎样投身到社会中去工作的呢?事实上,在我们毕业前,当时的校长沈祖荣先生和Miss Wood早已研究过如何帮助大家安排工作。我们八位插班生都知道这一点。我因为杜定友老师来信约我去广东工作已回信答应,在分配前告诉了沈先生,他也表示很高兴。杜老师是我在上海读书时引进图书馆学之门的恩师,后来他离开上海去广州中山大学工作。

回到上海后,我去商务印书馆找到总编王云五先生,告诉他我在学习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,请你审阅,看看是否有需要,能否出版,里面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。两个星期后,商务印书馆通知我,决定采用,可以出版,不过不打算买下版权,只能出版后按

抽版税的方式处理。我当然很高兴,当时想只要能出版总是好的,于是与之签了契约,每本书抽15%的版税。随后,我写信给母校告知此事,并问是否也可以作为文华图书馆丛书之一刊印。经学校答允,便在书名前也加上了丛书的称号。这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二本书。

当我告知家乡老父和其他亲戚读书毕业并找到工作即将去广州时,他们都很高兴,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读大学并且很快找到了工作的。

回想从小学、中学、师范、大同大学、国民大学到文华的过程,从6岁开始读书直到毕业,几近20年,而以在文华的最后两年收获最大。不仅出了两本书,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套提问题、找资料、构思组织,直到写出书来的功夫。这主要是在文华读书期间的收益,尤其要归功于“外文工具书”这门课的帮助。由此知道世界上种种书籍:首先是百科全书、字典辞典,进而包括各类科学、地图、手册、年表。记得当时讲课的房间就在图书馆里,四周摆满了各种工具书,胡庆生先生讲到哪一方面,就随手从中拿出一本来,介绍这是什么书、什么内容,怎样学习和怎样利用。结束前还出几个题目让我们课后钻研解答。我最喜欢这门课,它和以前学数学一样,先提出问题,一旦找到答案,心里非常高兴。现在学工具书这门课也是这样,提出了问题,自己去找答案。胡先生总是说:我讲的题目在这个房间里都可以找到答案。同学们各人找材料的时候,多少有点保密和相互竞争的气氛。我在学习的时候做过很多笔记。后来在写《索引和索引法》时,就采用过笔记中的材料。记得其中提到一个叫Poole的美国人,他决心下功夫对美国期刊上的论文统统作出索引,编一整套Reader's Guide,告诉读者如何利用索引法去收集材料,我对此特别感兴趣。我后来每讲到杂志索引时,常常把这些内容介绍给别人。

总之,我在文华学习虽然短短两年,收获极大。同时文华也对我情有独钟,我是第一个作为学生写出两本书,而且都被收入文华丛书的幸运儿。

(收稿日期:2007-06-05)